

香港非粵語母語者語言 轉移的初步探討

梁慧敏 李貴生

提 要

本文嘗試從社會語言學角度出發，調查在香港工作的非粵語母語人士日常會話中的語言使用情況，探討的範圍包括工作場所和非工作場所中粵語、普通話和英語所占的比重。文章會通過均值分析和變項比較，闡述香港非粵語母語者的語言兼用與轉移的實際情況，並探討語言轉移的背後因素。

關鍵詞：香港 粵語 非粵語母語者 語言轉移 語言兼用

一 引 言

粵語是香港一般口頭交際和日常生活的通用語言，⁽¹⁾然而在殖民地時代，香港官方的法定語文是英文和中文，並沒有特別提及粵語的位置。主權回歸以後，香港政府推行“兩文三語”（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的語言政策，當中“兩文”指中文和英文兩種書面語，而“三語”則指粵語、英語和普通話三種口頭語，粵語的法定地位由此得到明確的規定。

三語政策無疑有現實的需要,因為三種口頭語在香港社會上均有特定的作用,不容易互相替代,可是三語之間到底存在甚麼關係? 姚亞平在概括香港的語言狀況時曾引述鄒嘉彥的意見,認為:

高層語言是英語,低層語言是粵語,而漢語(普通話)在兩者之外亦占有一定的地位。^[2]

又表示“高層語言是比較正式的語言,低層語言是不太正式的語言”^[3]。不過根據2011年香港政府統計署的人口統計資料,以廣州話(粵語的代表)為日常慣用語的人口占89.5%之多,使用的範圍包括家庭場合、朋友聚會、購物用餐、電影娛樂、電視電臺、同事開會、法庭聆訊、官員交談、立法會辯論、學校授課語言、政府新聞發布等不同場景。既然粵語廣泛應用在不同的使用場合(domain),通行於社會、政治、教育等不同層面,若說“粵語是不太正式的低層語言”,恐怕未能全面反映香港語言使用的實況。根據社會語言學家 Charles A. Ferguson 的說法,要是一種本地語言的使用者超過總人口的25%,同時又是50%以上中學畢業生的教育用語,它就屬於社會的“主要語言”(major language)。^[4] 由是而言,粵語不但有正式的“高層語言”功能,同時也是香港的“主要語言”。

正是因為粵語在香港占有的強勢地位,非粵語母語者來港工作生活後,在不同領域上逐漸改用粵語作為交際語言,從而產生了語言兼用和轉移的情形。為了進一步瞭解香港口語使用的實況,我們於2009年6—8月期間在香港各區以隨意抽樣訪問的方式完成有效問卷1004份,調查“粵語在香港市民的日常會話中占的比重”。本文即以當中30位非粵語為母語的受訪者為研究對象,藉著分析他們的語言實際使用情況(包括非工作場所和工作場所),探討非粵語母語者語言兼用和轉移的問題,并嘗試綜合客觀環境、歷史演變和個人語言態度等因素歸納出一

些原因。

研究結果顯示,在香港生活的非粵語為母語受訪者為了適應本地的語言環境,須要在不同程度上掌握和運用粵語,結果產生了語言兼用現象,而且在某些領域上,粵語的使用頻率甚至比他們的母語還要高,連與家人或熟人交談時,都會放棄自己的母語而使用粵語。這種現象反映出受訪者的語言正從母語轉移向主流語言,雙語研究者把這個階段稱為“語言轉移時期”。至於未來的發展是雙語持續并行,還是母語漸漸退為第二語言,只在某些固定的場合才使用,則有待後續的觀察。

二 語言轉移研究的概況

語言轉移(language shift)是語言使用者在某些領域上放棄母語而轉用別的語言的一種接觸現象,與語言使用功能的變化有關,包括語言功能的擴大與縮小。語言轉移的不同流向、趨勢、結果關涉到複雜的政治、經濟以及民族心理等社會因素,遂引起各國學者的重視。

近年西方的研究指出,多語的構成與多民族或移民社區有關,例如美國、加拿大^[5-7]和西歐一些國家等,^[8-10]令有關領域逐漸成為近年的研究熱點之一。華人社會多樣的語言環境,同樣為各地學者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在語言轉移的問題上,華人學者的研究主要關注普通話對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各漢語方言相互的影響,普通話和漢語方言之間的影響,海外華人社區各語言、方言之間因接觸而產生的轉移情況,以及所在地受訪者的語言態度調查等等。由於研究者各有不同的社會背景,調查地點、對象、人數、方法又不盡相同,他們的研究起點也因而有明顯的差異。

總的來說,中國臺灣地區學者的著眼點多在語言多樣性的維持和語言政策的制訂上;^[11-16]中國大陸的研究則多從推廣普

通話、語言規劃和語言和諧的角度出發；^[17-19]新加坡學者除了比較當地居民對英語和華語的語言態度及使用情況外，還將目光投放在華語教學的展開和其他華語方言的保持上；^[20-21]馬來西亞學者基於國家語言政策，華語研究的方向明顯傾向於對華語的流失和維持的探討；^[22-24]英國方面，由於粵語使用者是當地華人的構成主體，因此研究者將重心放在英語對粵語的影響，以及由此產生的語碼轉換和語言轉移問題上；^[25-27]與英國不同，美國華人的族群構成要複雜得多，因此美國學者不僅探究華語向英語轉移和研究華語教學的問題，也分析不同華人群體的語言使用情況，進一步加深文化上的認同。^[28-31]

相較之下，香港的語言學者除了關注身份的認同問題外，對語言競爭的相關論題也極感興趣，較多地探討兩文三語及其他廣東方言消亡的問題。早期的研究較為集中在其他廣東方言向廣州話轉移的研究上，回歸後由於普通話的地位日漸提高，不少學者開始調查港人對普通話的態度，以及從不同角度審視港人的語言態度等。^[32-37]然而，過去在香港境內做的語言使用調查或未涉及粵、英、普三語職能的分析，或因調查數據年代久遠，不再適用於香港目前的語言形勢。為了更新相關數據與資料，以便更為準確地探討香港現時和今後的語言走向，本研究最近進行了一次語言使用調查。以下的討論將會集中在非粵語為母語者的語言使用狀況上，並由此考察香港地區語言兼用的情況。

三 問卷調查的設計

(一) 採樣方式

為探討香港社會上實際的語言使用問題，以及增加研究資料蒐集的完整性，本研究於2009年6—8月期間派員在新界、九

龍、香港島各區以隨意抽樣訪問的方式，瞭解“粵語在香港市民的日常會話中占的比重”，並且順利完成 1004 份有效問卷。受訪者都是在香港工作的在職人士，其中以粵語為母語者 974 人，以非粵語為母語者共 30 人。這 30 人所提供的數據正是下文分析和討論的基礎。

(二)問卷設計

調查問卷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調查對象的背景資料，包括母語、定居最久的城市、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包括類別和階層）。

第二部分是分別調查工作場所與非工作場所的語言使用情況，非工作場所包括與家人交談、與友人閑談、外出購物、在公共場所用餐、收看或收聽電視劇、電視新聞或者收聽電臺廣播、參與文娛康樂活動（如唱歌、看電影、舞臺劇、歌劇等）等場合下所使用的語言及其頻繁程度，而工作場所則包括與同級交談，與上級交談，與下級交談，與其他機構、企業進行業務上的交往，與工作服務對象交談，進行單位小組會議，在工作場所閑談，以及到政府機構辦事等場合下所使用的語言及其頻繁程度。頻繁程度則以 0 至 5 分為評量標準，最常使用者為 5 分，較常使用者為 4 分，一般情況下使用者為 3 分，較不常使用者為 2 分，最不常使用者為 1 分，從不使用者則為 0 分。

第三部分涉及語言態度的問題，調查受訪者對語言的看法，包括哪種語言最能正確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粵語在香港的重要性、學習和掌握粵語的用處，以及希望粵語達到什麼程度等問題。選項亦按程度劃分，最高分為 5 分，表示非常重要，4 分表示較重要，3 分表示一般，2 分表示較不重要，1 分表示非常不重要，0 分表示根本不需要使用亦可。

四 調查結果分析

(一) 基本資料

下面〈表1〉為此次調查受訪者的基本資料。性別方面,粵語組和非粵語組的比例差不多,女性稍多於男性,粵語組為52.6%與47.4%之比,非粵語組為53.3%與46.7%之比。年齡方面,粵語組主要是19—30歲這個組別,占53.5%,18歲以下組別則最少,只有6%;非粵語組主要是19—30歲和31—40歲兩個群組,分別占40%和30%,占最少是41—50歲,只有6.7%。非粵語組以普通話為母語者過半數,占63.3%,以英語為母語者占23.3%,其餘少數分別以其他漢語方言和外語為母語。到目前為止,受訪者居住最久的地方,粵語組是港澳地區,占95.7%之強,此外海外又比內地多,分別占2.9%與1.2%,非粵語組居住最長久的地方也是港澳地區,占53.3%,其後是海外和內地,百分比均等,分別占23.1%;教育程度方面,粵語組受訪者中學畢業(中五及中七)最多,占49.4%,大學(含大專)畢業或以上者占48.1%,僅次於中學畢業,非粵語組最多是大學畢業或以上,占53.3%(當中大學畢業占30%,碩士或以上為23.3%),中學畢業占43.4%。職業階層方面,就高中層來說,非粵語組的百分比都高於粵語組,專業人士和中層管理占43.3%,行政管理占6.7%,而粵語組則分別占30.9%和5.9%;最後是一般文職,粵語組占63%,超過半數,非粵語組占50%。

〈表 1〉基本情况統計

分項	細項	人次		百分比	
		粵語組	非粵語組	粵語組	非粵語組
性別	男	462	14	47.4%	46.7%
	女	512	16	52.6%	53.3%
年齡	18 歲以下	58	5	6.0%	16.7%
	19—30 歲	521	12	53.5%	40%
	31—40 歲	191	9	19.6%	30%
	41—50 歲	144	2	14.8%	6.7%
母語	英語	0	7	0%	23.3%
	普通話	0	19	0%	63.3%
	漢語方言	0	3	0%	10%
	其他外語	0	1	0%	3.3%
最久居住地	港澳	932	16	95.7%	53.3%
	中國大陸	12	7	1.2%	23.1%
	海外地區	27	7	2.9%	23.1%
教育程度	小學	22	1	2.3%	3.3%
	中五	352	8	36.1%	26.7%
	中七	130	5	13.3%	16.7%
	大學	404	9	41.5%	30%
	碩士	59	4	6.1%	13.3%
	博士	5	3	0.5%	10.0%
職業階層	行政管理	57	2	5.9%	6.7%
	專業人士、 中層管理	301	13	30.9%	43.3%
	一般文職及 技術工作	614	15	63%	50%

(二) 非粵語母語者語言使用情況

〈表 2〉為非粵語為母語者於非工作場所和工作場所的語言使用情況，括號內是粵語組的均值，作比較參考之用。值得注意

的是,粵語組在表內所有細項之中,粵語使用的均值都達 4.50 或以上,顯示粵語是一種使用頻度極高的語言。

現在先分析非粵語組在非工作場所中各個主要領域裏所使用的語言。數據顯示,非粵語母語受訪者外出購物和在公共場所用餐時使用粵語的頻率相當高,均值達 4.50 或以上,而與家人交談、與友人閑談、收看或收聽電視劇、電視新聞或者收聽電臺廣播、參與文娛康樂活動等幾項四個細項的均值則在 3—4 之間,即介乎一般常用與較常用之間,比括號內以粵語為母語者的均值為低。粵語組在與家人交談、與友人閑談、外出購物、在公共場所用餐、收看或收聽電視劇、電視新聞或者收聽電臺廣播、參與文娛康樂活動等幾項的均值都達 4.50 或以上,表示粵語的使用率非常高。又值得注意的是,非粵語為母語者於非工作場所使用粵語的頻率,均明顯高於普通話和英語。

工作場所方面,非粵語為母語者在粵語方面的使用率比非工作場所為低,均值介乎 2.85—3.43 之間;比較括號內的數據,他們使用英語、普通話的頻率都比粵語組要高。再細緻地看,非粵語組的粵語使用率,按均值高低排列分別是:

與同級交談 > 與下級交談 > 與其他機構、企業進行業務上的交往 > 與工作服務對象交談 > 與上級交談 > 進行單位小組會議
換句話說,工作場所的同級可能不乏本地人,因此大家交談時經常使用粵語,但進行大大小小的會議時,由於某些會議或有外籍人士的參與,所以會議改以英語進行,這反映出英語在會議領域上的特殊功能。儘管有以上差異,從實際的數字看,會議中使用英語和粵語的均值分別是 2.41 和 2.85,顯示兩者實際上並沒有拉開距離,即會議時兩種語言都十分常用。反觀粵語組的情況,會議中使用粵語的均值是 4.59,而英語只有 1.19,二者的差距明顯較非粵語組顯著,個中原因仍有待進一步探索。又與上級交談時,非粵語母語者使用英語的均值是 2 以上,同樣反映出工作場所當中,中高層管理者或有外籍人士,所以須以英語交談。

〈表2〉非粵語為母語者的語言使用情況(2009)

非工作場所			工作場所		
細項	均值		細項	均值	
家庭	粵:3.63	(4.93)	同級	粵:3.43	(4.77)
	英:1.30	(0.55)		英:1.70	(1.17)
	普:1.93	(0.34)		普:1.40	(0.54)
友人	粵:3.77	(4.97)	上級	粵:3.07	(4.57)
	英:2.07	(0.96)		英:2.03	(1.22)
	普:2.53	(0.53)		普:1.17	(0.34)
購物	粵:4.50	(4.99)	下級	粵:3.38	(4.80)
	英:0.87	(0.40)		英:1.67	(0.63)
	普:1.10	(0.18)		普:1.33	(0.37)
用餐	粵:4.57	(4.98)	業務	粵:3.25	(4.47)
	英:0.60	(0.43)		英:2.75	(1.69)
	普:1.13	(0.13)		普:1.65	(0.80)
電視	粵:3.73	(4.82)	服務對象	粵:3.21	(4.65)
	英:2.90	(2.48)		英:2.39	(1.98)
	普:2.00	(1.42)		普:2.11	(1.41)
文娛	粵:3.21	(4.50)	會議	粵:2.85	(4.59)
	英:3.04	(2.52)		英:2.41	(1.19)
	普:2.04	(1.53)		普:1.04	(0.35)

注:括號內的數字為粵語組的均值。

(三)變項比較

為瞭解非粵語為母語者的語言使用受到哪種因素的影響,本分節以社會科學統計程式(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s)軟體中的單因數變異數分析方法(One-Way ANOVA),通過比較不同場合語言使用的組內差異和組間差異的大小來確定影響因素,當顯著性小於0.05時,表示影響因素均值上存在顯著差異,反之,當顯著性大於0.05時即表示差異沒有顯著性。^[38-39]就非粵語組的情況來看,下面分別以年齡、職業階層、教育程度為影響因素變數,對各場合的語言使用情況加以分析,結果顯示粵語、英語、普通話在各領域中的功能,主要受制於年齡和職業階層等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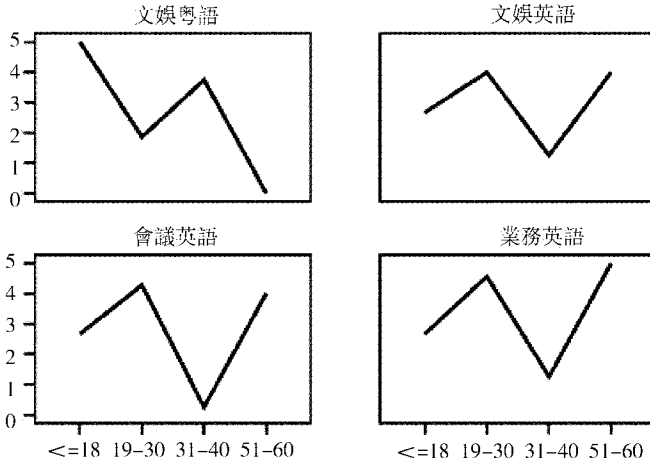
I. 年齡

〈表3〉受年齡影響顯著的變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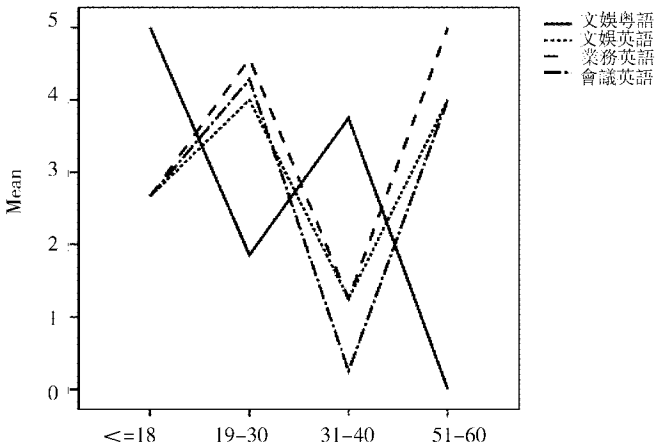
		平方和	df	均方	F	顯著性
文娛粵語	組間	44.242	3	14.747	4.753	0.010
	組內	74.472	24	3.103		
	總數	118.714	27			
文娛英語	組間	31.764	3	10.588	3.292	0.038
	組內	77.200	24	3.217		
	總數	108.964	27			
業務英語	組間	53.869	4	13.467	5.065	0.009
	組內	39.881	15	2.659		
	總數	93.750	19			
會議英語	組間	58.863	4	14.716	4.518	0.008
	組內	71.656	22	3.257		
	總數	130.519	26			

從〈表3〉可見,較受年齡因素影響的項目共有四個,分別是文娛粵語、文娛英語、業務英語、會議英語,它們的顯著性均小於0.05,即表示該影響因素均值上存在明顯的差異。當中最顯著的莫過於文娛粵語和其他三個變數的比較〈圖1〉,文娛英語、業務英語和會議英語的走向相近,在18歲以下組別都介乎2—3之間,即較少使用和一般常用之間;在19—30歲組別之中,大約是4,即較常使用;在31—40歲組別之中,却是1或以下,即較不常用,甚至從不使用;而52—60歲組別,又回升至4或以上。四個年齡組別三個變數暫時難以歸納其規律,但這三個變數與文娛粵語比較時,顯著性却十分突出,文娛粵語四個年齡組別的向度明顯不同(見〈圖1—a〉),文娛英語、業務英語、會議英語綫型呈低—高一低—高,文娛粵語却相反,呈高一低—高一低。文娛粵語之內,18歲以下組別和52—60歲組別的差異最為明顯,18歲以下組別在文娛康樂活動(如唱歌、看電影、舞臺

劇、歌劇等)中最常使用粵語,均值達5,而52—60歲組別則不常使用粵語,差不多是0;19—30歲組別文娛粵語大約是2,即較少使用粵語,與其他三個變數相反;31—40歲組別,文娛粵語大約是3—4,即一般常用和較常使用之間,亦與其他三個變數呈相反。下圖為這四個變數相對應的綫形圖:



〈圖 1-a〉 年齡變量綫形組圖



〈圖 1-b〉 年齡變量綫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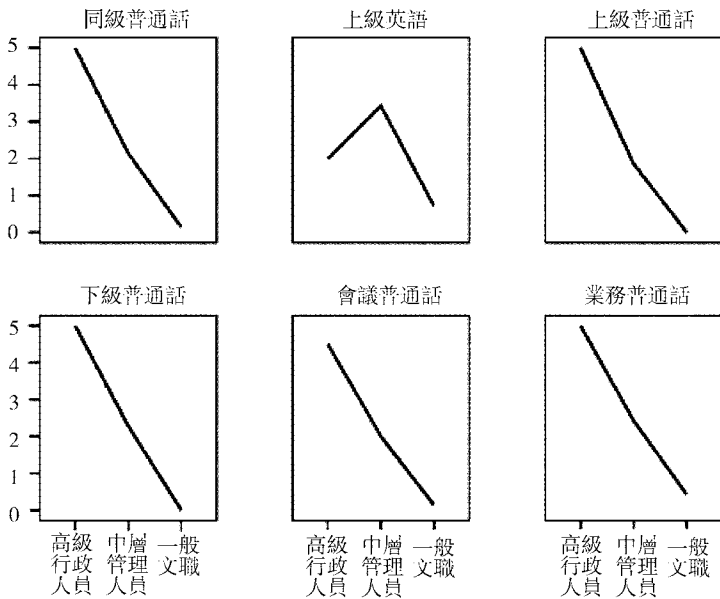
II. 職業

〈表 4〉受職業階層影響顯著的變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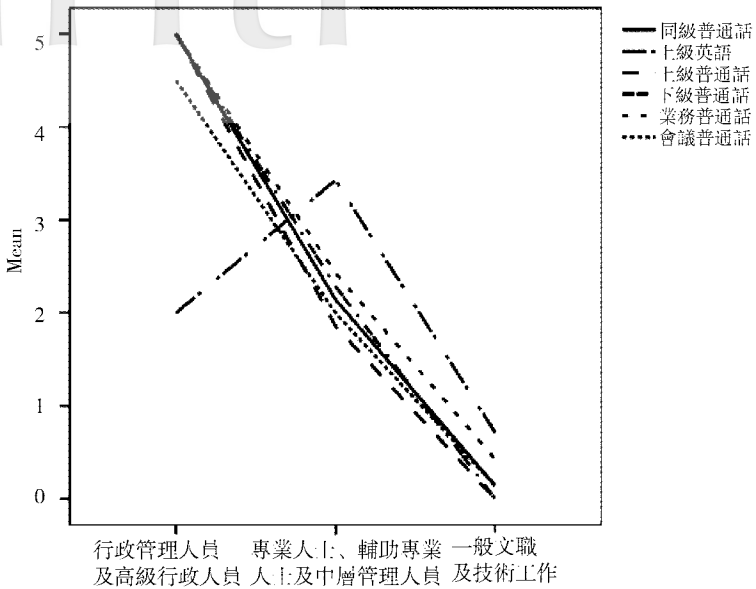
		平方和	df	均方	F	顯著性
同級普通話	組間	27.774	2	13.887	3.771	0.036
	組內	99.426	27	3.682		
	總數	127.200	29			
上級英語	組間	46.232	2	23.116	6.624	0.005
	組內	90.733	26	3.490		
	總數	136.966	28			
上級普通話	組間	32.288	2	16.144	5.257	0.012
	組內	79.850	26	3.071		
	總數	112.138	28			
下級普通話	組間	41.511	2	20.756	9.078	0.002
	組內	41.156	18	2.286		
	總數	82.667	20			
業務普通話	組間	31.661	2	15.831	5.088	0.019
	組內	52.889	17	3.111		
	總數	84.550	19			
會議普通話	組間	28.623	2	14.312	7.106	0.004
	組內	48.340	24	2.014		
	總數	76.963	26			
工作場所普通話	組間	30.174	2	15.087	3.820	0.035
	組內	106.626	27	3.949		
	總數	136.800	29			

〈表 4〉的數據顯示,三個職業階層(行政管理、專業人士和中層管理、一般文職及技術工作)不同語言的使用情況有顯著的分別,尤其是同級普通話、上級英語、上級普通話、下級普通話、業務普通話、會議普通話、工作場所普通話的顯著性均小於 0.05,即表示該影響因素的均值上存在明顯的差異。從〈圖 2〉可見,職位高低對特定場合語言使用有很顯著的作用,行政管理

階層最多使用普通話和英語，無論與同級、上級、下級、業務對象交談，或者開會語言、在工作場所閑談，都會使用到普通話和英語，均值介乎 4—5 而偏向 5，屬最常用或較常用的語言；而一般文職及技術工作在上述語言環境裏則很少使用普通話和英語，均值少於 1，甚至完全不必使用普通話和英語，而直接用粵語交談；專業人士和中層管理則在兩者之間，均值介乎 2—3，即一般常用或較少用。較為不同的其中一個變數是上級英語（見〈圖 2—a〉），其趨勢明顯有異於其他變數，估計行政管理階層本來就是高層，很多根本就没有“上級”，上級英語在專業人士和中層管理組別和一般文職及技術工作組別的走勢與其他變數相若，均值則稍高於其他變數，反映中層和下層面對著上級的時候都有機會說英語，尤其是位處中層的專業人士和管理階層，與上級交談時使用英語的均值介乎 3—4，屬一般常用和較常用之間。



〈圖 2—a〉 職業階層變量線形組圖



〈圖 2—b〉 職業階層變量線性圖

III. 教育程度

〈表 5〉是學歷因素在工作場所和非工作場所的顯著性指標,當中所有變項的顯著性都大於 0.05,即所有單因素分析都沒有變數體出現顯著性,這顯示了學歷一項在對語言的使用并無顯著的影響。

〈表 5〉教育程度因素影響下各變項的顯著性指標

變項(非工作)		顯著性	變項(工作)		顯著性
與家人交談	粵語	0.389	與同級交談	粵語	0.334
	英語	0.589		英語	0.385
	普通話	0.359		普通話	0.616
與友人交談	粵語	0.790	與上級交談	粵語	0.261
	英語	0.422		英語	0.215
	普通話	0.412		普通話	0.423

(續表)

變項(非工作)		顯著性	變項(工作)		顯著性
購物用語	粵語	0.467	與下級交談	粵語	0.071
	英語	0.742		英語	0.579
	普通話	0.563		普通話	0.398
公共場所用餐	粵語	0.241	與業務對象交談	粵語	0.240
	英語	0.268		英語	0.472
	普通話	0.631		普通話	0.427
收看電視 收聽廣播	粵語	0.324	與服務對象交談	粵語	0.094
	英語	0.782		英語	0.169
	普通話	0.564		普通話	0.720
文娛康樂活動	粵語	0.101	會議語言	粵語	0.220
	英語	0.992		英語	0.690
	普通話	0.971		普通話	0.476

五 語言兼用與轉移

(一) 語言轉移的一般情況

有了以上的認識後,我們現在可以深入考察香港的語言兼用問題。

語言轉移(language shift)是一個過程,沒有語言兼用的時期就沒有語言轉移的結果。人口遷移往往由社會、政治、經濟等原因而引起,新來者與當地人接觸後就會產生語言兼用現象。這種現象的特點是,要麼新來者學習當地居民的語言,如移民英、美、加、澳、紐的人學習英語,要麼原來的居民學習新來者的語言,如“大日本帝國”時期韓國人、臺灣人、琉球人學習日語。同一社會內長期共存著兩種或以上的語言,從而在各領域上造

成不同程度的語言競爭,這是語言轉移發生的前提;一段時間之後,操其他語言者必定兼通主流語言,從而產生語言兼用現象,或稱雙語現象(bilingualism);當語言兼用發展到一定時期,弱勢語言的成員就會陸續放棄自己的母語,向主流語言發生轉移,這個時候就是語言轉移時期。

從理論層面看,雙語現象可以指在同一社會內兩種語言共存的狀況,以及同一個人掌握兩種語言的狀況,即雙重語言和雙層語言。^[40]在前一種語言狀況中,兩種語言系統同時存在的情況可以反映在正式公文,傳播媒介和學校等方面。至於後一種語言狀況,即個人的雙語現象,指的是在語言層面上及在語言交際的領域裏,說話人掌握從一個語言系統轉用另一個語言系統的能力。據鄒嘉彥、游汝傑^[41]的觀察,雙語社會中的語言同化是一個漸變過程,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會具體經歷各個階段。他們以移民的語言為例,觀察了一代以上的移民的語言現象特徵,并把語言同化歸納為五個階段,即語言移借(客居期)、語言替代(聚合期)、語碼轉換(過渡期)、雙重語言(混同期)、殘餘干擾(同化期)。

可以預計,兼用現象發展下去會出現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雙語在往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穩定地繼續存在,如加拿大、比利時等地。人們最初各自操著自己的語言,後來該語言內有一些成員開始學習對方的語言,形成雙語或多語并存的現象,新習得的語言通常是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威望語言,如紐西蘭原住民毛利族學習英語。雙語現象得以持續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的左右,例如有否立法保護國內少數者的語言等,如瑞士等地。又雙語持續現象也有因應各國自身需要而存在,如在中國,普通話是政府、學校等的用語,而一般方言通常用於農村、非正式場合和民間文學之中,這種情況與許多阿拉伯國家(古典阿拉伯語對阿拉伯方言)相似。

第二種情況是雙語中較強勢的一方壓倒弱勢的一方,就像

香港粵語逐漸壓倒其他方言。如過去香港的水上人操蜑家話（粵語的一種變體），20世紀70年代政府先後安置各艇戶“上岸”生活，他們所使用的語言也就慢慢轉移到主流的廣州話，“至今只有西貢等少數小漁港有保留蜑家口音”。^[42] 強勢一方壓倒弱勢一方又可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弱勢語言隨著使用人口的減少而瀕臨滅絕（如滿語），甚至被消滅（如古中東腓利基語）；二是語言轉移，即原來的語言逐漸轉換為第二語言，如香港潮州人、客家人，甚至印巴籍人士的下一代，又或者美國南美裔移民的第二、三代；三是皮欽化（pidginization）或克里奧耳化（creolization），即語言雜交，產生母語和第二語言的混合體，既有母語也有第二語言的語言特徵，如毛里求斯語就是本土語和法語的混雜結果。

（二）香港的狀況

香港社會并非單一使用粵語，據我們的調查，非粵語母語者一般都會兼用粵語和普通話、粵語和英語，或粵語和其他方言，兼用的類型則多以粵語為主，兼用英語或普通話（見〈表2〉）。本節認為，非粵語母語者現在處於雙重語言期，會按不同場合、不同對象使用粵語、英語、普通話等語言系統。

非粵語母語者在非工作場所之中，包括與家人和友人交談、外出購物、在公共場所用餐、收看或收聽電視劇、電視新聞或者收聽電臺廣播、參與文娛康樂活動等幾個細項，都出現兼用普通話、英語情形，普通話均值介乎1—2.5之間，英語均值介乎0.5—3之間。工作場所方面，雖然粵語是較常使用的語言，但兼用普通話情況亦相當普遍，與同級交談、與其他機構企業進行業務上交往、與工作服務對象交談、進行單位小組會議等四項的均值皆高於2，與上級和下級交談、在工作場所閑談、到政府機構辦事等幾項均值介乎1—2，而業務、服務對象兩項普通話的使用與粵語更非常之接近。普通話之外，英語也是工作場所中

經常兼用的另一種語言,服務對象項均值高於2,在與同級、上級、下級、業務、會議、工作場所閑談等項目的均值都介乎1—2。整體來說,香港社會的語言環境以粵語最為常用,同時兼用普通話或英語的情況亦相當普遍,尤其是在工作場所。

至於非粵語為母語者在不同場合之中兼用普通話或英語的情況,可先參考以下資料:

〈表6〉在港工作非粵語為母語者的母語

母語	人數	百分比
英語	7	23.3%
普通話	19	63.3%
漢語方言	3	10%
其他外語	1	3.3%

30位受訪者的母語主要是英語或普通話,但根據我們的調查(見〈表2〉),他們無論在非工作場所抑或在工作場所中使用的語言都以粵語為主,這反映出他們的語言正從各自的母語慢慢地轉移到粵語。從語言功能的角度說,非粵語母語者在以粵語為主導的香港生活或工作,其母語只能退縮到某些領域上。以非工作場所為例,雖然所有項目的均值均比總人數的均值(4.5以上)為低,但購物、用餐兩項均值達4以上,家庭、友人、電視、文娛幾項均值達3以上,顯示粵語是他們較常使用語言。工作場所方面,總人數的均值在4以上,而非粵語為母語者在同級、下級、服務對象、工作場所、政府幾項的均值則在3以上,在上級、業務、會議幾項的均值亦接近3,反映出粵語是較常使用語言,甚至比他們的母語更為常用。從年齡組別來看,文娛康樂活動(如唱歌、看電影、舞臺劇、歌劇等)一項,18歲以下組別最常使用粵語,而52—60歲組別則不常使用粵語(見〈圖1〉),這正好說明年紀越輕的非粵語為母語者越能接受粵語為主要傳播媒介,預示了語言轉移的未來趨勢。

按常理說，非粵語母語者與家人交談時，最有機會使用母語，因為母語是從父母那裏習得的語言，家庭自然是維護母語的最佳場所和最後防綫。然而我們的調查却顯示（〈表 7〉），在香港工作的非粵語母語者，在家中與家人交談時，使用粵語的均值為 3.63，即介乎一般情況下使用與較常使用之間，雖然不及粵語組的 4.93，但顯示出除了他們的母語（英語、普通話、其他方言）之外，與家人交談時粵語有上升至常用語言的趨勢，這是探索語言轉移時一條饒富意義的綫索。與友人交談的情形相若，他們使用粵語的均值為 3.77：

〈表 7〉非粵語母語者語言使用均值

家庭	粵:3.63(4.93) 英:1.30(0.55) 普:1.93(0.34)
友人	粵:3.77(4.97) 英:2.07(0.96) 普:2.53(0.53)

注：括號內的數字為粵語組的均值。

這兩項數據意味著未來的語言發展，要麼是雙語并行，即有時說母語有時說粵語，要麼粵語成為他們下一代的母語，原來的母語退為第二語言。然而如果他們的母語是英語或普通話，可以肯定不會出現語言被消滅的結果，因為畢竟英語是國際語言，普通話則是國家語言，兩者都是政府致力提倡的語言，藉以維持本港在國際舞臺上的競爭力。因此英語和普通話在同化的過程中，最多只會因語言競爭而退居第二綫，成為下一代語言使用者的第二語言，與鑿家話、圍頭話使用者越來越少的命運不同。

六 語言轉移的因素

語言維護和轉移的概念最早由 Fishman^[43] 提出，他指出語

言維護和轉移研究所關心的并不是操不同語言的人互相接觸時產生了甚麼語言干擾,而是通過對語言維護或轉移研究,觀察語言與心理、社會或文化過程之間到底有甚麼關聯。影響語言轉移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人口、經濟、教育、政治、大眾傳播、社會、語言態度與語言規劃等。^[44-46]下面試從歷時性、共時性和個人語言態度等三個層面,探討非粵語母語者來港工作生活後產生語言轉移的原因。

(一) 粵語壓倒其他方言

從歷時角度來看,香港開埠初期粵語並沒有明顯的壓倒優勢,但2011年全港人口普查却顯示操粵語的五歲及以上人口竟達89.5%之高。下文試從人口流徙、市鎮發展、交通發展、人口增長幾方面說明現代化、都市化對語言轉移的影響。

1. 早期方言雜處

香港第一位西洋大主教史密夫神父(G. Smith)指出19世紀中葉香港島流通三種主要的方言(three principal dialects),即粵語、客家話和福佬話,它們彼此不能溝通,其中的粵語本地話(Pun-te / vernaculars)又可以分為三種口音:新安、番禺和南海。港島原居民和澳門移民說新安話,來自黃埔(位於廣州市東緣,鄰近珠江、番禺)的華籍居民說番禺話,來自佛山、南海的則說南海話^[47],各族群沒有統一的交際語。直至太平天國戰爭漫延至廣州,大批經濟地位較高的省城居民涌進香港避戰,粵語才開始立足香港,並成為市區的通用語,直至19世紀這種情況基本沒有太大變化。

20世紀30—50年代,大陸戰亂頻生,大量操不同方言的人,包括商人和文人,舉家逃到香港避開戰火,帶動了香港島以至九龍地區的發展,其中以隨資本家來港的上海話,和隨政要來港的藍青官話勢力較大。五六十年代香港的華籍居民分別來自不同籍貫,例如廣東人、客家人、潮州人、四邑人、上海人、北方

人,彼此講不同的方言,當時粵語依然沒有今天的優勢。不過這種情形很快就逆轉,因為正由於各種方言都不占優勢,大家開始以粵語作為交際中介,使粵語從不具壟斷地位的語言逐步變成占有絕對地位的主要流通語言:

各個方言族群都有放棄自己母語的趨勢,而且這在第 0 代移民身上便開始。但我們同時也發現,各個族群放棄母語的速度并不相同。在 1961 年之前方言流失得最嚴重的是四邑話、潮州話和閩南話,1961 年—1970 年期間流失得最嚴重的是四邑話、上海話、客家話。而同期間閩南話的流失速度却減慢了。總結整個時期,四邑話的流失量高達 93.7%。^[48]

關於香港都市化之前的語言狀況,張雙慶認為在 20 世紀 70 年代發展新市鎮以前,香港新界并不說粵語,至少不以粵語為主要流通語言:

其實,在都市化以前,在大批新市鎮出現之前,香港的郊區并不說廣州話,九廣鐵路就像一條臍帶,把廣州話帶到香港郊區。鐵路經過的地區,包括香港的新界,說的是另外一些方言……從方言的類別來看,新界的方言包括了漢語七大方言的三種方言,一是粵語,它以市區的廣州話為代表,圍頭話和客家話都是粵語的分支,而且圍頭話和東莞話還很接近,可稱為莞寶方言,寶即寶安。二是閩語,即所謂的福佬話,他們是來自海陸豐的漁民。三是客家話,是新界方言最具優勢的一種。^[49]

後來市區的人口已接近飽和,有必要將人口重新分布,港英政府遂發展新市鎮,於是從 70 年代起,政府將土地發展伸延到九龍以北尚未發展的地方,也就是由一條條的小村落組成的新界了。張雙慶認為九廣鐵路“把廣州話帶到香港郊區”,這種說法也有

一定的道理。70年代末香港的交通網絡和集體運輸系統大幅擴展,直接支援了新界新市鎮的發展,讓新界居民能很快的來往市區。地下鐵路自1979年分期通車,而九廣鐵路則於1983年實行雙軌電氣化,讓都會區與新界間的聯繫更形緊密,同時也模糊了語言的界綫。

II. 近幾十年粵語獨大

更準確地說,把廣州話帶到香港郊區並不是九廣鐵路,而是市區人口的流動。1976年至1980年間,各新市鎮內共百多座公共房屋落成,提供逾十萬單位供市區居民遷入。^[50] 70年代以後,新市鎮成功將二百多萬人口從市區分散出來,占總人口的35%。這35%的人口直接衝擊了說客家話、圍頭話和福佬話的新界。另一方面,為配合義務教育的推行,政府統一了課程規劃,無論是市區的主流學校,還是新界的鄉村學校,教學內容幾乎一模一樣,於是市區青少年和新界青少年都有接受同等教育的機會。凡此種種,加快地泯滅了新界和市區的界綫,語言的選擇亦是其中一種表現。新的集體運輸貫通了整個香港,消除了以往地方之間的語言隔閡,伴隨新市鎮發展的人口流動淡化了新界與市區的對立,新市鎮皆與鄉村為鄰。從另一方面看,都市元素慢慢滲入鄉村,墟市的地位為新市鎮中心取代,其他方言的使用亦漸漸為市區粵語取代。莊初昇:

最近幾十年來,隨著香港的都市化進程加快,在人口遷徙融和的背景,廣州腔的粵語(廣東話)在新界各地廣泛普及,新界原來的幾種方言土語,包括圍頭話、客家話和福佬話都相繼式微,使用人口越來越少。^[51]

正正說明急速的都市化轉變了新界的語言傳統,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語言運用趨向一統,產生了後來所謂香港人身份的“集體認同”。

人口因素包括操某一語言的人數及其地理分布,是左右語

言轉向的關鍵，因為人口密集更容易維護語言，如魁北克法裔維護法語，而居住在鄉郊的人比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更容易維護自己的語言，如香港新界、廣東的客家村維護客家話。當一種語言逐漸消失時，操該語言的人口的數目顯得尤為重要。〈表 8〉是香港政府統計處關於操廣州話、英語與普通話的五歲及以上的人口統計數字，以及占總人口之百分率，其他中國方言包括客家、潮州、福佬等沒有列入表內：

〈表 8〉慣用語言劃分統計

年份	廣州話	英語	國語(普通話)
1961	2 076 210 (78.98%)	31 824 (1.21%)	26 021 (0.98%)
1971	3 469 235 (88.13%)	41 119 (1.04%)	89 515 (2.27%)
1991	4 583 322 (88.67%)	114 084 (2.21%)	57 577 (1.11%)
2001	5 726 972 (89.2%)	203 589 (3.2%)	55 410 (0.9%)
2011	6 095 213 (89.5%)	238 288 (3.5%)	94 399 (1.4%)

統計數據裏，最明顯莫過於操“廣州話”人口的變化，無論使用人口和所占百分比均有上升趨勢，由 1961 年至 2011 年五十年內增加了四百萬，使用率亦由 78.98% 攀升至 89.5% 的絕大多數，按道理說四十年內不可能有四百萬人在香港出生。據劉鎮發、蘇咏昌研究：

1971 年香港政府統計署人口統計有關語言的部分是以籍貫為主的。其實講廣府話的人而自稱籍貫是“香港九龍及新界”的，只占總人口的 4%。^[52]

香港的人口來自五湖四海，有來自中國大陸的，也有是東南亞華僑，來香港的時間也各有不同，各自操著不同的方言口音。然而，因為此間粵語無與匹敵的優勢，他們都放棄了家鄉的方言，改說本地占強勢地位的粵語，而粵語也就順理成章的成了他們下一代的母語。四十年來，操“廣州話”人口的上升正好從側面反映這些移民和他們的下一代出現了語言轉移的情形；至於操

英語者的百分比也由 1961 年的 1.21% 上升至 3.5%，2011 年人數達二十餘萬；普通話則朝反方向發展，1971 年時香港共有 2.27% 人口使用普通話，1991 年遞減至 1.11%，回歸後 2001 年更降至不足 1%，2011 年回升至 1.4%，唯使用人口仍不足十萬。這些統計多多少少透露出語言使用情況和語言轉移現象的一些訊息。

(二) 粵語最具競爭力

從共時角度去說，今天香港流通於大街小巷的廣州話無疑是優勢方言 (prestige accent)，政治、文化、經濟、傳播、人口幾方面都極具競爭力。粵語的流通與傳播媒介影響有很大的關係，廣播、電視、電影用語、立法會辯論、政府新聞發布都是粵語，地方報紙上的文章偶爾也出現方言文章。這一點相當重要，當某一語言與大眾傳播機構聯繫在一起時，便獲得了維護和傳播的動力；同樣道理，當強勢語言與公共服務發生聯繫時，便削弱了弱勢語言的流通程度，例如我們的調查顯示，到政府機構辦事使用英語和普通話的均值都少於 1，而粵語却接近 5，在在說明粵語獲得了語言維護的動力。

〈表 9〉是全樣本非工作場所和工作場所語言使用頻率均值表。以非工作場所使用語言為例，據我們收回的 1004 份問卷所提供的數據，除了文娛康樂活動之外，非工作場合粵語使用頻率均值接近 5，即“最常使用的語言”；而職場當中各領域所使用的粵語，均值都達 4.53 或以上，即是傾向“最常使用的語言”，尤以與同級交談和在工作場所閑談這兩項均值最高：

〈表 9〉非工作場所/工作場所語言使用頻率均值表(全港)

非工作場所	均值	工作場所	均值
與家人交談	粵:4.90 英:0.57 普:0.39	與同級交談	粵:4.73 英:1.18 普:0.57

(續表)

非工作場所	均值	工作場所	均值
與友人交談	粵:4.93 英:0.99 普:0.59	與上級交談	粵:4.53 英:1.24 普:0.37
購物用語	粵:4.97 英:0.41 普:0.21	與下級交談	粵:4.77 英:0.66 普:0.39
公共場所用餐	粵:4.97 英:0.43 普:0.16	與業務對象交談	粵:4.43 英:1.72 普:0.83
收看電視 收聽電臺	粵:4.79 英:2.49 普:1.44	與服務對象交談	粵:4.61 英:2.00 普:1.43
文娛康樂活動	粵:4.47 英:2.53 普:1.54	會議語言	粵:4.53 英:1.22 普:0.37

香港是一個四方雜處的社會,除了人數上占優勢的廣東人之外還有福建人、客家人、上海人、北方人等等各地人士。昔日的人口調查,都有記錄市民的原籍,當中主要以廣府人為主,其次是四邑人及潮汕人,再其次是來自上海及江浙地區的新移民,各有各的方言。直到現在,香港通行的方言仍然也有它複雜的一面,例如流行在新界的圍頭話、客家話、福佬話等。唐英年^[53]表示香港約有六分之一居民是福建人,人數達百多萬,然而2011年人口調查却顯示操粵語者達89.5%,這一方面反映粵語是本地的共同語,另一方面反過來證明在語言競爭之中,福建話的使用範圍和人口不斷萎縮的事實。華族以外,在香港居住和工作的外國人,以菲律賓人最多,接近14萬人,占人口的2%,其次為南亞人、英國人、日本人、韓國人、泰國人、印尼人等,各有各的語言,彼此不能通話,為了在此間生活、工作,他們或多或少都曾學習粵語。

當粵語取得壓倒性的優勢以後,開始向標準廣州音靠攏,往往不容許其他粵語變體,否則就會被訕笑語音不正。關於粵語

的社會地位問題,何矜的話可用作這點的注腳:

這是一個多麼奇異的社會。當香港人要把好好的廣東話夾雜上鬼文,却沒有任何人耻笑。但當外省同胞盡力學習本地語言,與閣下溝通時,却不容人的語音有半句不正。^[54]

這種社會上根深蒂固的看法加速了各大方言向香港粵語靠攏,而操粵語也成爲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一個重要的特徵。

(三) 語言態度

語言態度指人們在社會認同和個人感情等因素的影響下,對一種語言的看法和評價,這些看法與語言使用和語言能力緊密相連,也直接影響人們往後對該語言所採取的行動。說話人對語言持積極態度有利於對該語言的維護,反之就會導致語言轉移。除了使用該語言的成員外,整個社會對某一語言的態度也是影響語言維護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如加拿大魁北克省操法語的人對自己的語言及其文化越來越感到驕傲而產生熱情,甚至催生了主張魁省獨立的政黨。如果整個社會對某一種語言持消極的態度,將會影響人們不積極學習該語言,甚至不去使用該語言。20 世紀末開始,沈依青、高一虹等、龍惠珠、曹逢甫、黃雅榆、王遠新和王萍等^[55-60]相繼從語言態度的不同側面開展研究,他們採用變量配對、語義微分量表、直接調查和間接調查等方法發現了一些可供探討的亮點,並且獲得一些有意義的結論,例如語言態度的構成要素、某些因素(如職業背景)對語言態度的決定性影響等。

本文採用直接訪問的方法,在 30 個受訪者中展開有關語言態度的初步調查(見 3.2),試圖瞭解在香港工作的非粵語爲母語者,對粵語抱著什麼樣的語言態度,而這種態度又如何影響他們選擇語言的取向。〈表 10〉以 5 爲最高值,0 爲最低。均值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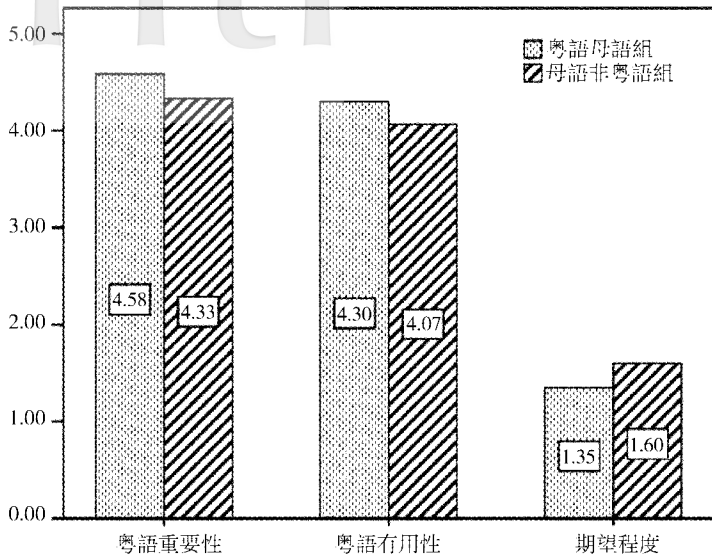
示非粵語為母語者認為，粵語在香港的重要性介乎非常重要與較重要之間，學習和掌握粵語傾向認為較有用。當被問到希望粵語達到什麼程度時，在“A. 能流利準確地使用”、“B. 能進行一般交際”、“C. 能聽懂說話者的意思”、“D. 沒什麼要求”四個選項之中，平均值顯示受訪者的願望介乎 A 和 B 之間，顯示受訪者希望能流利地使用粵語進行一般交際。值得一提的是，以粵語為母語的受訪者均值是 1.35，比非粵語母語受訪者的 1.60 為低，顯示前者對自己掌握較高程度粵語的期望比後者為低，原因則有待進一步探究。

〈表 10〉語言態度均值比較

	粵語組	非粵語組
粵語重要性	4.58	4.33
粵語有用性	4.30	4.07
期望程度	1.35	1.60

調查又顯示，雖然 30 位非粵語母語受訪者以不同的語言或方言為母語，但在香港這個環境中工作，他們顯然都不約而同地意識到此間粵語的社會地位非比尋常，粵語在政治、文化、經濟、傳播、人口幾個領域都顯示出強大的競爭力，從市民日常交流，到學校教育、工商行業，到政府辦公、立法會選舉，到新聞傳媒、大眾娛樂，粵語都居主導地位，而香港的大眾媒體及娛樂事業的繁榮又反過來促使粵語繼續保持無與匹敵的優勢。^[61-62] 受訪者都希望能掌握粵語進行一般交際，又或者能流利準確地使用，這種態度直接導致他們在實際環境中使用粵語的意願。

不過，非粵語為母語者對粵語所持的態度，是對粵語主動認同，還是礙於實際環境而被動地接受和學習粵語呢？對於這個問題，本調查未能提供答案，但下圖的語言態度均值分布起碼能夠視為對粵語語言態度的指標。除非未來政府的語言政策大轉變，或者外來人口大量遷入，否則粵語獨大的事實以及市民現有的語言態度是不會有太大改變的。



〈圖3〉 語言態度均值分布

總 結

本文試圖從社會語言學角度出發,在特定範圍內調查在香港工作的非粵語母語者的使用粵語情況。結果發現,受訪者的母語多為普通話或英語,而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現語言轉移的情形,而在非工作場所轉向使用粵語的情況則尤其明顯。這種處於雙重語言的現象正是語言同化的一項表徵。又他們在工作場所的各個領域內,都會兼用到普通話或英語,特別是與上級交談和開會的時候,均值都比以粵語為母語的受訪者為高,估計他們的母語優勢正是獲聘來港工作的其中一個原因。再往下分析,三語在各領域中的功能,較為明顯地受到年齡和職業階層兩種因素的制約,例如年紀越輕越常使用粵語、中層在職者兼用普通話或英語的頻率較高等。至於非粵語母語者語言使用發生轉

移的原因，與本地歷時背景、共時狀態，以及個人語言態度等因素密切相關。

(作者：香港教育學院中國語言學系助理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系副教授)

注釋：

- [1] 粵語，又稱為廣州方言、廣東話、白話等。粵語內部按其語音特徵和地理分布又可分為廣府、四邑、香山、莞寶、高陽、桂南等不同的方言片，本文的“粵語”係指以廣州話為代表的廣府片。
- [2] 姚亞平《中國語言規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3] 同注[2]。
- [4] 徐大明、陶紅印、謝天蔚《當代社會語言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 [5] García, Ofelia, 'New York's multilingualism: World languages and their role in a U. S. city'. in Fishman, Joshua A. and García, Ofelia (ed.) *The Multilingual Apple: Languages in New York City*, 3—50.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Co, 1997.
- [6] Fishman, Joshua A. and García, Ofelia. (ed.) , *The Multilingual Apple: Languages in New York City*.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7.
- [7] Fishman , Joshua A. (ed.) , *Can threatened language be saved?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Revisited: A 21st Century Perspectiv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1.
- [8] Broeder, Peter and Extra, Guss, *Language and ethnicity in education: Case studies on immigrant minority groups and immigrant minority languag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9.
- [9] Extra, Guss and Yagmur, Kutlay, *Urban multilingualism in Europe: Immigrant*

- minority languages at home and school*.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4.
- [10] Yagmur, Kutlay and Mehmet-Ali-Akinci. Language use, choice, maintenanc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of Turkish speakers in Franc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64:107—128. 2003.
- [11] 洪惟仁《臺灣的語言政策何去何從》,《各國語言政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2),頁501—542。
- [12] 曹逢甫、黃雅榆《客語危機以及客家人對客語和政府語言政策的態度》,發表於“客家公共政策學術研討會”(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2)。
- [13] 陳淑娟、江文瑜《語言使用與族語維繫——以泰雅族水田部落為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報》(2005.12),頁139—154。
- [14] 黃東秋《巧語回春》(臺北:師大書苑,2003)。
- [15] 黃宣範《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臺北:文鶴,2001)。
- [16] Yeh, His-nan, Chan, Hui-chen and Cheng, Yuh-show, Language Use in Taiwan: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Domain Analysis, *Journal of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49.1: 75—108, 2004.
- [17] 同注〔3〕。
- [18] 李宇明《權威方言在語言規範中的地位》,《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5),頁24—29。
- [19] 戴慶廈《語言競爭與語言和諧》,《語言教學與研究》(2006.2),頁1—6。
- [20] 陳松岑《新加坡華人的語言態度及其對語言能力和語言使用的影響》,《語言教學與研究》(1999.1),頁81—95。
- [21] 雲惟利《語言環境》,《新加坡社會和語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華語文化研究中心,1998)。
- [22] 王曉梅《馬來西亞雪蘭莪州萬津華人的語言維持和語言轉移》,《中國社會語言學新視角——第三屆中國社會語言學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 [23] 洪麗芬《試析馬來西亞華人母語的轉移現象》,《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8.1),頁32—41。
- [24] 郭熙《馬來西亞檳城華人社會的語言生活》,《中國社會語言學》(2003.創刊號),頁107—114。

- [25] Li, Wei, *Three Generations, Two Languages, One Family: Language Choice and Language Shift in A Chinese Community in Britai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4.
- [26] Li, Wei. 'Chinese'. In Britain (ed.) *Language of the British Isles*, 308—32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7] Raschka, C., Wei, L., and Lee, S., Bilingu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networks of British-born Chinese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Language* 153:9—25. 2002.
- [28] Luo, Shioh-Huey and Wiseman, Richard L.. Ethnic language maintenance among Chinese immigrant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4 .3: 307—324, 2000.
- [29] He, Weiyun Agnes and Xiao, Yun. (ed.),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 [30] Pan, Shiwen, 'Chinese in New York City'. In Fishman & García (ed.) *The Multilingual Apple: Languages in New York City*, 229—255.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7.
- [31] Wong, Sau-ling Cynthia and López, M. G. (ed.),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of Chinese background: A portrait of diversity, New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32] Bacon-Shone, J. and Bolton, K. Charting, 'Multilingualism: Language censuses and Language Surveys in Hong Kong'. In M. C. Pennington (ed.) *Language in Hong Kong at Century's End*, 43—90.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 [33] 鄒嘉彥、游汝傑《漢語與華人社會》(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3)。
- [34] 鄒嘉彥、游汝傑《社會語言學教程》(臺北:五南圖書2007.)。
- [35] 劉鎮發、蘇咏昌《從方言雜處到廣府話為主——1949—1971年間香港社會語言轉型的初步探討》,《中國社會語言學》(2005.5),頁89—104。
- [36] 龍惠珠《港人對廣東話及普通話態度的定量與定質研究》,《中國語文》(1998.1),頁66—73。
- [37] 龍惠珠《從職業背景看語言態度的分層》,《外語教學與研究》(1999.1),頁56—63。
- [38] 尹海潔、劉耳《社會統計軟體 SPSS 15.0 for Windows 簡明教程》(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 [39] 余民寧《心理與教育統計學》(臺北:三民書局,2005)。
- [40] 同注[34]。
- [41] 同注[34]。
- [42] 麥啓德《香港漁民的福音事工研究》《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2007.9)。
- [43] Fishman, Joshua,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as fields of inquiry. *Linguistics* 9: 32—70, 1964.
- [44] 徐世璇《語言瀕危原因探析——兼論語言轉用的多種因素》,《民族研究》(2002.4),頁56—64。
- [45] 同注[22]。
- [46] 同注[34]。
- [47] Zhang, Z. J. (張振江),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early Hong Kong (1841—1884)*,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hD dissertation, 2004.
- [48] 同注[35]。
- [49] 張雙慶《香港有多少人的母語是廣州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博文網站(2004.4.28)。網址:<http://bowen.chi.cuhk.edu.hk/>。瀏覽日期:2009年10月11日。
- [50] 香港地方《七十年代尾公共屋村》,香港,網址:<http://www.hk-place.com/view.php?id=213>。瀏覽日期:2009年10月9日。
- [51] 莊初昇《香港新界方言》(香港:香港商務印書,2003)。
- [52] 同注[35]。
- [53] 唐英年《福建個人游須中央配合》,香港政府新聞網,網址:<http://www3.news.gov.hk/isd/ebulletin/tc/category/businessandfinance/030825/html/030825tc03001.htm>。瀏覽日期:2009年10月11日。
- [54] 何羚《醜陋的香港人》(香港:次文化堂,1990)。
- [55] 沈依青《語言態度初探》,《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12.2),頁92—98。
- [56] 高一虹、蘇新春、周雷《回歸前香港、北京、廣州的語言態度》,《外語教學與研究》(1998.2),頁21—28。
- [57] 同注[37]。
- [58] 同注[12]。

- [59] 王萍《南京方言態度差異研究》，《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2008.9)，頁90—92。
- [60] 王遠新《廣東博羅、增城畚族語言使用情況調查——保護瀕危語言的重要途徑》，《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1)，頁115—125。
- [61] 李貴生、梁慧敏《香港工作場所中三語使用的初步調查》，《中國語文研究》(2010年第29期)，頁97—110。
- [62] Lee, K - S. (李貴生) and Leung, W - . M. (梁慧敏), The status of Cantonese in the education policy of Hong Kong. *Multilingual Education*, 2:2, Spinger.

Abstract: A Preliminary Study of Language Shift of Non-Cantonese Native Speakers in Hong Kong

LEUNG Wai-mu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LEE Kwai-s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veryday language use of non-Cantonese native speakers who work in Hong K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inguistics. The three languages, namely Cantonese, Putonghua and English, will be examined closely in terms of their frequency of use in both workplaces and non-workplaces. By comparing the mean scores and related variables, this study further discusses and explains the phenomena of language shift of non-Cantonese native speakers.

Keywords: Hong Kong, Cantonese, non-Cantonese native speakers,
language shift, bilingualism